

附：《满文大藏经》

重印故事

傅开穆

《满文大藏经》的历史

《满文大藏经》（又称《清文全藏经》《清文翻译全藏经》）是以汉文《大藏经》及藏文《甘珠尔经》为底本翻译、刊刻而成的佛教典籍总汇，代表着清雕版印刷及装潢的最高水平。全书乾隆三十八年（一七七三年）开始译刻，竣于乾隆五十五年，原印本共一百零八函（夹），收佛教经典六百九十九种，计两千五百三十五卷，刻版（梨木经版）四万八千两百一十一块，九万六千四百二十二页，约一千七百八十万满文字。贝叶夹装（又称梵夹装），双面朱印，每页长七十三厘米、宽二十四点五厘米，每页三十一行，每行六至七字。当时共印十二部。根据目前所掌握的情况，存世的《满文大藏经》仅有两部，一部分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七十六函）和台北故宫博物院（三十二函），另一部存于西藏布达拉宫。

清代满文印刷品中工程最大的就是《满文大藏经》。乾隆皇帝在《清文翻译

全藏经序》中写明了译刻此经的意图：“盖梵经一译而为番，再译而为汉，三译而为蒙古。我皇清主中国百余年，彼三方久属臣仆，而独阙国语之大藏，可乎？以汉译国语，俾中外胥习国语，即不解佛之第一义谛而皆知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不亦可乎？”

故宫博物院藏《满文大藏经》原刻梨木经版在乾隆朝时保存在西华门内的清字经馆（即满文经馆）。嘉庆四年（一七九九年）经馆改为乾隆实录馆，《满文大藏经》的经版与其他内府经版一同移至午门五凤楼上。民国时，历史博物馆成立之初，为开辟展室，将经版分别移至午门外东朝房和太和门内东库房内。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批经版归故宫博物院保管，存放在故宫西北角楼。历经两百多年的尘封，这批经版亟需整理和保护。为了抢救这批珍贵的传统文化遗产，二〇〇一年五月，故宫博物院院长办公会决定并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在整理该经版的同时，由紫禁城出版社补

全、印制、装裱重印出版《满文大藏经》。借此机缘，这批经版才得以重见天日。

曲折艰辛的重印过程

《满文大藏经》的重印工作由故宫博物院朱诚如副院长主持，紫禁城出版社总编孙关根任总监制。首先于二〇〇一年七月初至八月中旬，在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保卫处、图书馆、工程处及紫禁城出版社共同组织协调下，开始陆续对《满文大藏经》经版进行装箱、运输。近五万块经版由故宫西北角楼运至位于北京大兴的华艺斋古籍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由该公司员工开始对经版进行除尘、除虫、除卵、登记、造册工作，共清理出完好《满文大藏经》经版两万五千八百六十二块（合五万一千七百二十四页。另发现从未著录的《蒙文大藏经》经版八千余块）。随后便开始对清理后的《满文大藏经》经版按经名、卷号、正反面顺序进行整理，并试印刷和装裱。

清乾隆版《满文大藏经》（一函）

故宫博物院藏

每函经页由内层上下护经板夹护，外包金黄色织锦面，再由外层上下护经板夹护，再用五色丝棉线斜纹交叉编织而成的经带捆扎起来



清乾隆版《满文大藏经》的内装潢

每函侧面在经页顺序码放整齐后，会组成喷焰摩尼图和火焰图纹样

因年代久远，少量原刻经版已糟朽而不具备印刷条件，另有部分经版缺失，通过查核故宫藏原印本补充了两万九千五百三十四页（补充的这部分由江苏金坛古籍印刷厂进行印刷、装裱），但还有部分经版处于缺失状态。为此，故宫博物院先与台北故宫博物院进行接触，希望能借到其所藏《满文大藏经》，但最终未果。后故宫博物院、紫禁城出版社派责任编辑张楠、江英，以

及摄影林京前往西藏布达拉宫，在布达拉宫管理处处长强巴格桑的帮助下，于布达拉宫红宫（布达拉宫建筑群中间最高的红色建筑，是举行佛事活动的场所，佛教典籍和艺术品集中于此）内南侧的殊胜三界殿内见到了布达拉宫供奉的《满文大藏经》。经考证后发现，该部《满文大藏经》与故宫藏版本、装潢完全一致（且布达拉宫所藏《满文大藏经》侧面金墙上绘有火焰等图案的封印还保存完好）。于是，在布达拉宫管理处处的支持下，故宫《满文大藏经》经版缺失的部分由布达拉宫藏经补全。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布达拉宫发现其所藏《满文大藏经》也因故缺失了一函，于是紫禁城出版社在完成《满文大藏经》的重印后，又将其所缺一函的重印本送至布达拉宫，使其得以完整。

为了使重印的《满文大藏经》最大限度还原历史原貌，责任编辑张楠、江英与北京华艺斋古籍印务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华艺斋）的任志厂长和技师们一起，在制版、印刷、装裱的过程中努力克服了一系列重大技术难关。首先，《满文大藏经》以木刻原版朱色水印装裱而成，其所需朱色水墨的制作工艺早已失传。在北京某墨汁厂研制三个月效果不佳的情况下，责任编辑与北京华艺斋古籍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的任志厂长和技师们在寻访老匠师、讨教旧工艺的基础上，经过努力钻研，采用多种方法，经过上百次试验，终于调制失传已久的可以

湿裱的朱印水墨。此外，由于大量的缺版必须胶印补全，经过责任编辑和技术人员的努力，也找到了一种替代胶片的科学方法，成功地解决了制版和上版困难，不仅节约了成本，也为日后古籍的整理出版摸索出了一条新的途径。

其次，《满文大藏经》的装潢复杂考究。其装帧形式为梵夹装，不同于传统的梵夹装的是，其每函（夹）均无钻孔，经页由精雕细绘的护经板夹护，然后通过层层包裹、密密缠绕的方式将经页精心保护起来。每函由经页、内层上下护经板、内经衣、外层上下护经板和外层经被组成，内层上下护经板皆为木质，外包金黄色织锦面，装饰华丽，绘有佛像，并书有汉、蒙、藏、满四种文字。每函侧面在经页顺序码放整齐后，会组成喷焰摩尼图和火焰图纹样。外层护经板为木质红漆描金，上以泥金绘宝瓶、宝伞、金轮等吉祥图案。内层经页、护经板以丝质黄色绣金线云纹经衣对角包裹起来，并以与经衣质地、颜色相同的绦带捆绑。外层护经板上下保护好经函后，用五色丝棉线斜纹交叉编织而成的经带捆扎起来，最外面再用黄色丝棉经被包裹。如此异常复杂的裱褙工艺已濒临失传，负责印制的技师们也表示以前从未接触过。为此，张楠和江英两位责任编辑带领北京华艺斋古籍印务有限责任公司的技师一起特地前往四川德格印经院考察学习

藏族雕版印刷术，这为之后的成功重印创造了条件。回到北京后，技师们再进行摸索、钻研、试验，最终将一函函装潢精美、富丽堂皇的《满文大藏经》完美重印了出来。二〇〇二年十一月，重印本《满文大藏经》正式出版发行。至二〇〇二年底，整理一新的《满文大藏经》经版也全部按原刻经版顺序编号装箱，安全运回故宫博物院收藏。

《满文大藏经》的出版意义

自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底，历时两年的时间，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紫禁城出版社所有员工几乎都参与了院藏《满文大藏经》经版的整理工作，加之与组织协调工作的故宫博物院办公室、保卫处、工程处、资料信息中心（现为故宫博物院数字与信息部）等多个部门的员工，前后两百余人参与到了这项浩大的出版工程中。全院众多部门鼎力相助，才有了紫禁城出版社此次重印的圆满成功，如此大规模的出版工程，可以说是空前绝后了。此次重印《满文大藏经》仅印了二十部，除故宫博物院图书馆收藏一部外，其余全部入藏国内外图书馆及研究机构，更显其弥足珍贵。（二〇一八年，为满足宗教界、学术界的需要，故宫出版社出版了《满文大藏经》精装版，分一百零八册，另附目录索引一册）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二〇〇二年紫禁城出版社重印的《满文大藏经》（总目录函）
徐继维 摄

重印本《满文大藏经》的出版，对于保存濒于失传的满族语言和文字、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有着极为深远的意义。其出版过程的艰辛与曲折，注定将在故宫出版社乃至全国出版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本文内容参考孙关根《藏传佛教众神——乾隆满文大藏经绘画》「后记」，紫禁城出版社，二〇〇三年；张楠《布达拉宫里的〈清文翻译全藏经〉》，《寻根》二〇二一年第二期；陈芳《满文〈大藏经〉的装潢》，《紫禁城》二〇〇一年第四期）



故宫博物院图书馆藏二〇〇二年紫禁城出版社重印的《满文大藏经》（总目录函）内页
徐继维 摄



清乾隆版《满文大藏经》内其中一块护经板的刻版